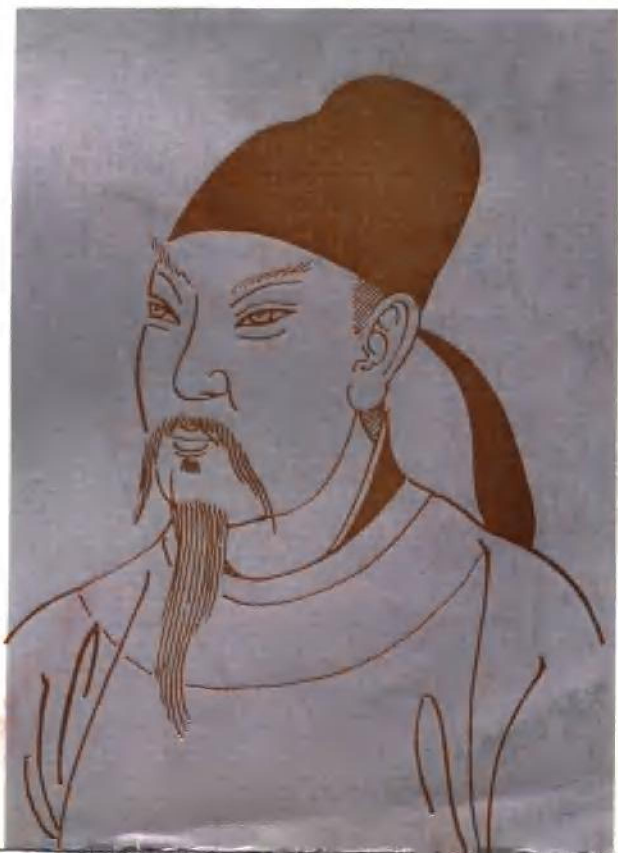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白论

● 乔象钟 ● 齐鲁书社 ●



李 白 论

乔象鍾 著

*

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70 千字

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,700

书号 10206·112 定价 1.55 元



李白像 潘絮兹绘图

目 次

李白从璘事辨·····	1
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·····	29
李白的思想特点及其社会根源·····	54
李白的诗论及其艺术实践·····	76
李白《古风》考析·····	101
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·····	129
李白诗歌中的妇女群象·····	148
论李白的山水诗·····	170
李白作品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特征·····	188
附录	
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赏析·····	217
谈《河岳英灵集》·····	224
后记·····	233

李白从璘事辨

一、前 言

李白从永王璘一事，作为历史事件来看，不仅当时使他不见谅于唐朝统治者，受到系狱、流放等惨酷的迫害，以致垂暮之年，经历了很大的风险；而且以后也不见谅于一些学者文人，受到严厉的责难与诟骂，甚至影响到对他的诗歌的评价。虽然李白诗歌本是我国文学史上流传最广而又深入人心的，人们通过他的诗歌，本来可以感到他傲岸不屈的灵魂和豪爽的气魄；但由于从璘一事，有些人也不免心上笼罩着一点疑云，而好事者更从而进行挑剔。所以从璘一事，是关系李白生平的一件大事，也关系到评价他的诗歌，有探索辨明的必要。

对于李白从璘这事的看法，从来就是很分歧的。一种认为是从逆不道，有亏大节，如朱熹就是这种看法的积极主张者，他说：“李白见永王璘反，便怂恿之，诗人没有头脑至于此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这是认为李白不仅在行动上参与了永王幕，而且看见永王谋反时，还怂恿永王去谋帝位。沿至清朝，洪亮吉也持这样的看法，他说：“诗人不可无品，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。杜工部、韩吏部、白少傅、司空工部、韩兵部尚矣，李太白于永王璘已难为讳，至王、杨、卢、骆及崔国辅、温飞卿等不过

轻薄之尤，丧检则有之，失节则未也。”（《北江诗话》）这显然把李白说成连温飞卿也不如的丧失节操的罪人了。

另有一种看法与上述的相反，认为李白之从璘，是由于胁迫，虽然他本人也有些疏于考虑，但并没有什么地方污损了他的高洁的人格。苏轼就是这一种看法的代表。他在《李太白碑阴记》中说：“太白之从璘，当由胁迫。不然璘之狂肆寝陋，虽庸人知其必败也。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永王璘之无成，此理之必不然者也。吾不可以不辨。”清人潘德舆也赞同这个看法，他说：“……夫胁而来，逃而去，辞官弃金，未污爵赏，白之心事行迹亦可以告天下后世矣……。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）他们认为李白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。

现在我们应该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来要求李白，但也不是说对这件事不需要认识清楚。有人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，如冯沅君在《中国诗史》中便是这样说：“永王重其才名，辟为都督僚佐，一同东下。此事前人或加责难，或加辩护；但从各种记载看来，事实是真的，殊不必辩护。而且作永王的幕僚，于理也无不合，也用不着责难。”这种不了了之的态度，实际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也有人把永王谋乱的性质，归之为普通王储位置的争夺，只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，没有必要为之分辨是非，如说唐代的王位承继权一向很不牢固，何况唐肃宗也是乘安史乱时分兵北走，自立为皇帝的。因此永王璘看到唐玄宗西走四川，于是他想乘机建立功业，谋取帝位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这本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，是很难说谁正谁逆的。这种说法前人也早有过，如明王稚登在《李翰林分体全集》序中所说就是如此。这首先是对永王事件的经过和性质认识不清楚。因为第一，根据史书所载，当安禄山陷洛阳进逼

长安时，玄宗仓皇携太子和亲信西走，这时太子亨（肃宗）的王储位置久已确定（开元二十六年亨被立为太子，安禄山乱后，天宝十四载十二月，又命亨监国，亲督诸军），玄宗在马嵬又曾示意传位李亨，后来李亨在灵武即位，玄宗在四川得讯后道：“吾儿顺天应人，吾复何忧。”并立命韦见素、房琯奉传国玉玺到灵武传位。可见肃宗之即帝位，虽然是在战争期间，不合常规，却也不是擅自攘夺。其次，永王之节度江南西道等道，是在玄宗赴四川途中才授命的，并不是永王见玄宗西走，想乘机建立功业。而他后来的称兵割据，也还在玄宗传位之后，这就不能说是一般的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了。

至于永王应不应该称兵割据，必须就当时的形势发展对整个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影响来考虑。因为安禄山的叛乱，一方面是玄宗养痍遗患，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发生的；另一方面，又因为安禄山是胡人，本有民族矛盾的因素。叛乱发生后，安禄山驱少数民族军队骚扰中原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和平生活，这时，民族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了。这点非常重要，是丝毫也不能忽视的。就当时形势来说，肃宗王位的巩固，统治者内部的统一，可使整个民族国家不至失去重心。这样不但可使北中国的人民少受残杀劫掠的痛苦；并可使全国秩序迅速恢复，也是当时全国人民殷切的愿望。关于这点，我们从杜甫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歌中便可以深切体会得到。如在《悲陈陶》中说：“都人回面向北啼，日夜更望官军至。”又在《北征》中说：“伊洛指掌收，西京不足拔。官军请深入，蓄锐可俱发。……祸转亡胡岁，势成侵胡月。胡命其能久，皇纲宜未绝。”可知陷入胡骑践踏下的中原人民，是如何日日夜夜地在盼望官军的归来了。而永王的趁机攘夺王位，当然抵消了当时的抗敌力量，增加了

人民的苦难，对当时千百万受难人民和整个民族国家来说，是不利的。所以永王事件的是非性质，并不难分辨。

然而，我们就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和总的形势来说明永王的是非性质，并不等于说李白从璘也是叛逆。这两件事虽然相互间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究竟是两件事，不能加以混淆。

由于前人对李白从璘一事，有着非常分歧的意见，并因此形成争论，而争论之历千余年也未解决，又因为各有所根据的材料。我试图参照历史记载和李白诗文加以剖析，看看是否能够探索得事实真象，为这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粗浅的意见。

二、李白在安禄山变乱初期的苦闷心情

我们阅读李白自安禄山乱起以至从璘期间的作品，可以了解李白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也可以了解李白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参加了永王幕的。

不少人认为李白的诗名虽高，但只迷醉于醇酒神仙，并不关心民生疾苦，说他的诗歌中很少象杜甫那样的关于人民辗转流离的苦难的描写。宋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便说：“李太白当王室多难，海宇横溃之日，作为诗歌不过豪侠使气，狂醉于花月之间耳，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，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！……。”宋黄彻在《碧溪诗话》中也说：“白之论撰，亦不过为玉楼、金殿、鸳鸯、翡翠等语，社稷苍生何赖？……历考全集，爱国爱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。……窃谓如论其文章豪迈，真一代伟人；如论其心术事业，可施廊庙，李杜齐名，真忝窃也。”

但是李白果真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关心人民国家，

徒事吟风弄月的帮闲词客吗？我以为只要看李白这一时期的诗歌，就可以得出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结论。

李白这时期的诗歌，虽然没有象杜甫的那样关于人民流离死亡的如实描写，却也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祸福的。他没有产生杜甫那样的诗，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，因为他没有陷入贼中，和被难的人民一起流离奔走，当然不可能凭空想象出那些情景而写出那样的诗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安史叛乱的痛恨，对人民、国家的忧心焦虑，郁积于衷、发为慷慨的悲歌，感人也是十分深刻的。

当洛阳沦陷之后，李白一方面为洛阳人民的遭难而痛苦，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不能报国只有逃难而悲愤。在《古风》（十九）中他说：“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冠缨。”^①又如在《扶风豪士歌》中说：“洛阳三月飞胡沙，洛阳城中人怨嗟。天津流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撑如乱麻。我亦东奔向吴国，浮云四塞道路赊。”在这些简短的诗句里，诗人所寄于惨遭胡兵屠杀的洛阳人民的哀伤是很明显的。同时也就在洛阳人民惨遭浩劫之际，李白个人也陷于困顿和流亡之中。他虽然遥想西入长安，但事实上是东奔吴越，诗中有句云：“张良未逐赤松去，桥边黄石知我心。”可见李白在奔亡吴越时还是想找一条道路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无奈“浮云四塞道路赊”，有志无由伸展而已。

在同时期所作《猛虎行》中他说：“朝作猛虎行，暮作猛虎吟。肠断非关陇头水，泪下不为雍门琴。旌旗缤纷两河道，战鼓惊山欲倾倒。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马反衔洛阳草。一输一失

^① 《古风》十九王琦和黄锡珪的年谱均未系入，但按这里所引的诗句来看，显然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

关下兵，朝降夕叛幽蓟城。巨鳌未斩海水动，鱼龙奔走安得宁？”

这里看得更明显，他那种朝朝暮暮的哀伤心境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正是为了“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马反衔洛阳草”，是为了国家的命运和苍生的祸福。而他自己当时的处境却是“有策不敢犯龙鳞，窜身南国避胡尘，宝书玉剑挂高阁，金鞭骏马散故人”。是处于一种无路可进，无由效力的境地，只有把满腔的悲愤，寄于诗歌而已。在“有策不敢犯龙鳞”这句诗中，更可以看到李白因天宝初年被放后，对统治者所抱的一种顾虑重重的心情。然而由于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关切，又使他不能不把唯一的希望，仍然寄托在当时最高统治者——皇帝的身上，所以对于那个曾经率意放逐他的唐玄宗，他还是怀着惓惓不能忘怀之情。在《溧阳赠宋少府陟》一诗中他说：“早怀经济策，特受龙颜顾。白玉栖青蝇，君臣忽行路。人生感分义，贵欲呈丹素。何日清中原，相期廓天步。”被谗、放逐，原是对李白精神上的严重打击，但他却仍然以“感分义”、“呈丹素”的心情在怀念着玄宗，这里虽然表示了李白的忠君思想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他的最后目的是在于“清中原”、“廓天步”，最终的理想，还是想要拯救中原一带受难的人民。

他也曾利用可能的机会，寻找引荐，以期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所以在《赠常侍御》^①一诗中说：“燕赵期清浇，周秦保宗社”，“登朝若有言，为访南迁贾。”

然而李白的希望并没有实现，后来他在《赠张相镐》的诗里，回忆到这一时期不平静的心情时也写了同样的话：“石勒窥

^①《赠常侍御》一诗黄锡珪年谱系于乾元元年，按诗中“安石在东山，无心济天下，一起振横流，成功复潇洒”，不似流夜郎以后的作品，似应系在入永王幕前的至德元载。

神州，刘聪劫天子。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，誓欲斩鲸鲵，澄清洛阳水。”正是李白当时壮士心怀的写照。“誓欲斩鲸鲵，澄清洛阳水”也说明他想要消除外族的侵略，拯救中原人民。罗大经所谓“苍生祸福曾不系其心膂”的说法，显然是不符事实的。

与这些诋毁之论相反，李白对国家命运和民族祸福是非常关切的，充满了奔腾的热情，朝夕希图为之效劳。他的痛苦在于他不仅多年受谗，被逐，郁郁不得伸其志，甚至在国家危难之际，仍然没有可以为国献身的机会。所以他才说：“揽涕黄金台，呼天哭昭王。无人贵骏骨，绿耳空腾骧。”（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这是多么沉痛而悲愤的呼声。

我们决不能把李白这些悲愤，简单地看成是他徒为个人穷通而发的牢骚。更重要的，应该认识到这是李白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所发出的呼吁之声。在上面所引的这首诗中他就曾这样说：“汉甲连胡兵，沙尘暗云海。草木摇杀气，星辰无光彩。白骨成丘山，苍生竟何罪？”这可以说是代表当时受难人民向统治者提出的控诉。这控诉包含着千万人民的血泪与仇恨。又如在《经乱离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》一诗中李白也说：“苍生疑落叶，白骨空相吊。连兵似雪山，破敌谁能料。”当时李白看到人民象落叶一样死亡枕藉，沦入浩劫之中，而这种灾难究竟到何日为止，竟是茫茫不可预料的事。这是对统治者失望的谴责。在这样看不见前途，四望无告的情形下，李白才采取了退守的打算。他说：“我垂北溟翼，且学南山豹”，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。我们还应知道，这时李白已五十六岁了，迟暮的感觉，更增加了他的消沉的情绪，如在这首诗中最后说：“勿以墨绶苦，

来求丹砂要。华发长折腰，将贻陶公诮。”一个人在苦于无可为力时，想要洁身引退，有什么可以罪咎的地方呢？

长安沦陷后，他的痛苦更深，悲愤也更切，而与此同时，他的消极退隐的思想也有了发展。如在《门有车马客行》中虽然慨叹着“北风扬胡沙，埋翳周与秦”，但他自己却“雄剑藏玉匣，阴符生素尘。廓落无所合，流离湘水滨”，他依然是“廓落”、“流离”，不得其所，最后是“恻怆竟何道。存亡任大钧”。他已完全陷于失望之中，只想去归隐了。所以接着在《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》一诗中便说：“吾非济代人，且隐屏风叠。”

李白之所以痛苦，更在于他并不能完全作到如他自己在失望之余所想的那样：“明朝拂衣去，永与海鸥群。”或者能恬然自适，作到象他所说的那样：“勿以墨绶苦，来求丹砂要。”他并不能真正象陶渊明那样隐晦韬光，蛰居山林，而是热情激荡，不能自己。就是庐山深邃的烟云，也锁不住他那为苍生为中原焦虑的热情。当人民临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东西两京均已沦陷之时，他被一种热烈的感情冲击着，这种感情怎能使他冷眼旁观地安居屏风叠呢？

以上我所分析的就是天宝十五年春天到入永王幕前李白心情的变化。这是一个充满痛苦、探索、失望和希望的过程。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中，他避入了庐山屏风叠，而又不能安之若素的在屏风叠隐居下去。李白之从永王璘，除了客观上的重要原因外，他本人思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三、李白究竟是怎样从璘的？

李白从璘是由于胁迫呢还是出于自愿，是争论颇多的一点。

首先是新旧《唐书》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就不一致。《旧唐书》李白本传说：“玄宗幸蜀，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、扬州节度大使，白在宣州谒见，遂辟从事。”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是自愿，但既说白“谒见”，大致是可以引伸为是自动前去的。《新唐书》李白本传说：“安禄山反，白转侧宿松匡庐间，永王璘辟为府僚佐。”这里虽也看不出是由于胁迫，却更看不出是出于自愿。

胁迫说和自愿说最明显地成为问题，大约首先见于苏轼和苏辙这两兄弟之间。如上面所引过的，苏轼认为“太白之从永王璘，当由胁迫”。而苏辙在《诗病五事》中则说：“永王将窃江淮，白起而从之不疑，遂以放死，今观其诗固然。”

以上所举新旧《唐书》记载的分歧和苏氏兄弟意见的不同，在所述理由和所述事实上，都是不够详确的。首先是《旧唐书》的记载显然失实：（一）据《通鉴》等载，玄宗幸蜀途中是以永王璘充“山南东道、岭南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都使”，不是“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”，《旧唐书》此处对永王官职的记载，不但与《通鉴》、《新唐书》不同，而且和《旧唐书》的《璘本传》的记载亦异，显然有误；（二）据李白诗文所记，入永王幕是在浔阳，时白隐居庐山屏风叠，因此《旧唐书》所谓“白在宣州谒见”就不可信，自愿入幕之说更没有根据，这是很显然的。关于这点，赵翼在所著《瓯北诗话》曾列举李白有关诗文并断言：“是璘至浔阳始招致之，而《旧唐书》谒见璘于宣城者非也。”其次，苏轼的以李白能识郭子仪为理由，断定入幕为胁迫，也不能成立。因为一则太白识郭子仪一事，并无可靠的唐人记载；二则即算能识郭子仪于行伍中，并不一定能识永王逆谋于未发之际，要以此来断定李白从璘由于胁迫，还缺乏充

足的说服力。但苏辙的以白诗断定为自愿更是牵强附会的。因为李白在其诗文中，都明白说到是永王胁迫他入幕的。在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中说：“仆卧香炉顶，餐霞嗽瑶泉。开门九江转，枕下五湖连。半夜水军来，寻阳满旌旛。空名适自误，迫胁上楼船。”又在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中云：“属逆胡暴乱，避地庐山，遇永王东巡胁行。”很显然的，按李白自己的诗文，则是胁迫，而不是自愿。如果苏辙所说的诗不是依照这种诗，而是单指《永王东巡歌》，也不能得出“永王将窃江淮，白起而从之不疑”的结论，道理我将在下面详谈。

因为在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及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中，李白自叙是由于胁迫，于是自愿说者，首先就要否定其所述之真实性，而胁迫说者也要着重肯定李白诗文所记的真实性。自愿说的宋人葛立方在《韵语阳秋》中就举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及《自荐表》所述予以否定，说李白“乃用《书怀》以诎其过耳”。而胁迫说的清人潘德舆在《养一斋诗话》中则肯定《书怀》和《自荐表》，并取别的诗文及他人论断“合而勘之”，断言“白从璘，始由胁迫”。

如果真能从李白的有关各种诗文及他人的论断合而勘之，事实的真象是容易明白的。葛立方因为《自荐表》和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诗都是永王败后所作，所以说这些诗文是“诎过”之词，并无更多根据，只是一种臆测，并不足以为据。可是另外，在《致贾少公书》中，李白也谈到入幕时的情况，而且谈的比较详细，是考察他入幕经过的重要材料。而且这封信是入幕当时之作，^①并不是璘军败后所写，不能认为是李白用以来

① 威维翰也认为是李白将从璘而未动身之前所作。

文过饰非的。

我们现在就来着重谈谈《致贾少公书》的内容，从而考察李白入幕时的情况。书中曾说：“王命崇重，大总元戎，辟书三至，人轻礼重。严期迫切，难以固辞。扶力一行，前观进退。”从“辟书三至”、“严期迫切”等情看来，显然是永王必欲致之，而固辞也不可能，所以说是“胁迫”，并非过度。

自然，永王究竟是礼聘他，还不是用绳索套着他的脖子拉他；李白也不曾采取那么坚决拒绝的态度。而且就当时情况，李白也没有采取这种态度的必要。如上所述，李白的隐居屏风叠，原是出于权且自安的退一步打算。在他《赠王判官》诗里，就曾自嘲地说：“苦笑我夸诞，知音安在哉？”“吾非济代人，且隐屏风叠。”可见他原是怀着不甘的心情归隐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上文中已经谈的很多。可是就在这时，永王忽然东巡至浔阳，并且招致他入幕，李白究竟应不应该入幕？可不可能不入幕？这和永王当时的地位、势力，以至永王当时和唐帝国中央（肃宗）的关系如何，都有联系，所以我们还必须简单地介绍永王当时的情况。

如《通鉴》所载：“至德元载十一月，肃宗勅璘归覲于蜀，璘不从。”“十二月，永王擅引舟师东巡，沿江而下，军容甚盛，然犹未露割据之谋。”据此，则永王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已违王命，但还不能判定他将来必然叛变（按太白集中有《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》，可见当时战争期间，对王命遵从得不十分严格的，也曾有人）。因此肃宗虽然布置了韦陟、高适等在淮南、江东“共图璘”，但并未正式动兵征讨。李白当时深居庐山，对肃宗和永王间的相互图谋，当然是不可能充分了解的；但他对永王不向河洛杀敌而东巡的行迹，却是有怀疑的。否则以他心

怀报国之情，为什么又要在胁迫之下才成行呢？李白这种疑惧的心情，正是他入幕前踌躇不就的重要原因。

信中又说：“以足下深知，具申中款。惠子知我，复何间然。”可以从这几句话看出，李白与贾少公是推心置腹的深交。近人戚维翰在所著《李白研究》一书中也认为：“且系好友，其情极真实可靠”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相信，李白这封信上所倾诉的，是他当时思想活动的真实情况，并没有什么矫造与虚饰在内。

他在信的开头，便表述了自己消极而又矛盾的心情：“白绵疾疲薶，去期恬退，才微职浅，无足济时，虽中原横溃，将何以救之？”这几句话重心长的话，说明李白当时在庐山，不仅心绪不好，而且身体也很衰惫，可见他之所以要隐居，事实上也有着各种不得已的苦衷。然而，就是在这样衰病、苦闷的境况下，他仍然以“中原横溃，将何以救之”为念，一种对国家、对人民的责任感，使他对隐沦生活也于心不安。所以又说：“且殷深渊庐岳十载，时人观其起与不起，以卜江左兴亡；谢安高卧东山，苍生属望。白不树矫抗之迹，耻振玄邈之风；混游鱼商，隐不绝俗。岂徒贩卖云壑，要射虚名？”他不但认为他的出山与否，有关广大人民以至国家兴亡（我们也可以设想到永王璘也曾经以这样的大义要挟过李白，把李白作为他号召江淮人士的资本）；同时也嘲骂了当时那些沽名钓誉的名流高士。接着下面他就向贾少公说明自己此去的心愿，是在于“报国荐贤，持以自免”，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心思，而且从这句话和前面的“扶力一行，前观进退”的语意看来，李白原无长留永王幕中的打算，那么“从逆”的动机也就更谈不到了。李白还深恐自己的心思不为挚友贾少公所理解，后面又接着以“斯言若谬，天

实殛之”两句话进一步表白自己的心迹。这样盟天誓人的沉重心情，我想不但是贾少公，就是千载下的我们读到此处，也应该对李白有所谅解，同情他的困难处境和他大公无私的真诚的情感。李白也了解他的此行是含有危险性的，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又说：“勾当小事，但增悚惕！”他提醒自己随时小心警惕，庶可免于灾难。但事实发展的结果，竟使他的一切谨慎和戒心，都不曾使他免于灾难和不幸。

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：李白之从永王，受强力的胁迫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；其次，李白也有借此尽一点自己能力，促使形势好转的报国心愿。王琦在分析李白入幕时的动机时也说：“考天宝末年，宗室诸王若吴王祗、虢王巨皆受命将兵，文人才士岂无入其幕者？太白之受辟于永王何以异是，后之擅领舟师东下，命将交兵，其始岂遽料其至此乎？”

事实也正是如此，李白一进便不及退，在短短一个月中，永王割据之谋一露，即归败亡，而统治者加之于李白的迫害也就接踵而来。

四、李白在永王幕中

据《通鉴》载，永王于至德元载“十二月甲辰引舟师东下”。甲辰是十二月下旬（约为廿四或廿五日），《新唐书》载：“二载正月永王入鄱阳。”鄱阳离浔阳不远，抵浔阳当在二载正月，那么李白的被胁陷入，也当在正月。《旧唐书·肃宗本纪》：“二载二月戊子，永王璘败，奔于岭外，至大庾岭，为洪州刺史皇甫侑所杀。”戊子是二月上旬，（约为八或九日），此处所指应该是永王丹阳之败；《通鉴》：“二月戊戌永王璘败死。”戊戌为二